

情欲书写与性别政治

——20世纪90年代以来女作家笔下的男色书写

刘国欣

内容提要 本文选取20世纪90年代以来女性作家笔下描写男性性工作题材的小说进行分析、考察,揭示作为边缘性群体的男性性工作者在女性作家视野中的生存状况和生活经历、思维方式以及感情体验,并选取具有代表性的女性文本分析男性如何被性化、物化,以及女作家如何对这些男性进行价值判断,进而反映男性性工作者形象所呈现出的文化内涵和个人情感诉求。

关键词 女性文学 男色 情欲书写 性别政治

刘国欣,南京大学中国新文学研究中心博士研究生 210023

随着社会的改革开放和西方思潮的涌入,对性和身体知识获得的渠道越来越多,女性的自我意识也越来越强。整体而言,20世纪90年代以来,与男性作家相比,女性作家更坚定地于性别不平等的控诉,女性作家笔下的男性性工作者(狭义而言,也俗称男色),是女性的“他者”。女性站在“他者”对面,对男性形象进行特殊建构,将他们从父权制的整体社会制度下推远,拉进边缘的阴影里,展现他们生命状态里被遮蔽的角落,刻画他们雌伏的一面。女性作家在作品里一再对男性实施“侵犯”和“阉割”,这既反映了女性地位的提升,也一定程度上让两性之间传统的较为温情的相处之道表现出赤裸化倾向,反映出两性斗争的泥淖仍然在持续,但在斗争之中,却也存在讲和和沟通,有走向和谐的可能。

福柯的《规训与惩罚》提出了有关身体的“权力技术学”和“政治经济学”。在他看来,肉体也直接卷入某种政治领域,权力关系直接控制它、干预它,给它打上标记;训练它、折磨它,强迫它完成某些任务,表现某些仪式和发出某些信号。肉体也是一种生产力,受到权力和支配关系的干预,肉体只有既具有生产能力又被驯服的时候,它才可能变成一种有用的力量。权力正是施之于个体,才得以在社会的各个层面得以传播复制^[1]。改革开放以后,社会环境逐渐变得宽容,女性解放运动也能相对深入发展,女人的经济和消费相对都从容起来,种种传统伦理和政治话语逐渐失去了权威性。于是,男色消费开始逐渐变得多起来。男性的身体也开始大量在市场的消费环境中接受女性目光的审视,开始扮

[1][法]米歇尔·福柯:《规训与惩罚》,刘北成等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年版,第27-29页。

演商品的角色。本文主要分析张洁的《她吸的是带薄荷味儿的烟》(1993年)、叶弥的《城市里的露珠》(1999年)、陈玉春的《男色》(2002年)三篇小说中的男性人物形象,从中探求不同年代女性作家塑造的不同的男色形象以及女性对异性、对感情的渴望与诉求。

一、女性对抗男性

张洁的小说《她吸的是带薄荷味儿的烟》(以下简称《烟》)写了一个靠推销自己性能力傍富婆的男性性工作者,结果推而不销落入尴尬的境地。张洁的写法,除了女性意识的觉醒,和西方思潮在中国产生的影响不无关系。张洁在《烟》之前的作品《方舟》,对于其他女性作家很有影响。王安忆、陈染、林白等许多女作家殊途同归沿着这一条女权主义标杆的线路创作了很多作品。但张洁自己,不同时期有不同的变化。在《烟》这篇女权色彩特别浓厚的小说里,有对历史的反思和人性的反省,但更多表达的是对男性以性为霸权中心潜意识渴望以此征服女性的蔑视和愤怒。在作品里,女舞蹈家角色反转,借社会地位和个人成就羞辱了一番男性。

小说《烟》里,张洁不再固执地坚持“爱,是不能忘记的”,她笔下的男性不再是童话和神话里的男性,开始跌倒在尘埃的世俗生活里,变得猥琐不堪。张洁用尖刻、老辣的中老年女性的目光,一方面向内审视自我的性别意识和情感需求,另一方面对男性的情欲和意图进行了描写和批判。年老色衰的女舞蹈家,当然,因为成功过有一定的社会地位,多年沧桑让她对男性没有什么兴趣,但是当年轻男人通过多次写信表达自己的性能力,想通过男色勾引她的时候,她还是将计就计,给了他一个展演自己的机会。在落地灯的暗影里,她气定神闲地指挥着这个男人一件一件剥光了自己的衣服。不过,她用他所不断强调的性能力成功地羞辱了他,使他渴望通过献出男色来达到目的的美梦破产。在这里,张洁通过塑造一个男性性工作者的畸形心理来表达对男性的看法,但同时也暴露了年老色衰的女舞蹈家变态畸形的一面。男女性别的强烈对抗让这篇小说的格局显得有点狭隘,男性神话被剥开,中老年妇女在对爱情婚姻幻灭之后的琐屑尴尬以及无止境的怨毒也流泻出来。

这部作品与众不同之处在于改写了看与被看的性别对象。大多数文学作品里,女性是被看的,女性的身体可以展览和销售,男性身体则有太多的禁忌,但在《烟》里面,老年女舞蹈家是观看对象,既观看年轻男性的身体,也观看他的灵魂。在历史和文学史语境里,女色总是受到种种曲解,女人因为“性”受到各种非难,为了生存或者因为被剥夺生活的主动权,很多女性进入到出卖肉体的古老的行业里,甚至,性工作者产业链,也多指的是女性。新世纪之初,“妓女”二字被换成“失足妇女”写进相关的法制条文,但是,“失足妇女”仍然是女性,强调女性卖身的可能性。然而,张洁却在90年代,将传统的性别视角颠倒过来。在这篇小说里,追求被女性消费的男色出现在舞台。可以说,在历来不平等的关于性工作者的描写中,大胆的描写男性渴望通过变卖自己的身体谋取利益的意识,张洁算是较早拥有者。通过作品,张洁将男性对自身集体的性优越提出质疑,它的独特性是鲜明的,带给人特别的触动和震撼。

二、女性欲望与男性的生存危机

叶弥《城市里的露珠》(简称《露珠》)女主人公“我”出于“我需要”的感受,同时“养两个男人”,东西城各一,就如东宫西宫一般,是对古代宫廷的戏仿。王小波的《东宫西宫》亦如此隐喻,这是作家的有意为之,无非表明女主人公能力超强,居高临下。“我”如同露水夫妻一样养着两个男人,可是两个男人提出生孩子要求时,“我”明确地拒绝了,毫不犹豫地表达了自己的主导意识。在这里,传统女性的温柔与善良、牺牲与奉献已经被遮盖,女性不再靠性行为 and 性生育来体现自己的主要价值,而是互相

帮助,结成小集团,对以男性为中心的社会进行嘲弄和反抗。《露珠》中,以“我”为代表的女性消遣男色,砸烂以男性为消费对象的俱乐部,建立“夏娃俱乐部”,顾名思义,是女子为主的俱乐部。

“夏娃俱乐部”和虹影在书本上所建立的“康乃馨俱乐部”是一致的,是一种对传统的破坏和颠覆,同时也是女性的自建。但是如同王安忆借助“弟兄们”男性化的词汇来表达女子情谊一样,这样的俱乐部的精神是可怀疑的,它的建构从开始就是脆弱的。这种女性联盟的提出首先从陈染开始。1994年,陈染提出“超性别意识”,她认为真正的爱(主要指爱情之爱)应该超于性别之上。她解释超性别意识时说:“人类有权利按自身的心理倾向和构造来选择自己的爱情。这才是真正的人道主义!这才是真正符合人性的东西!”她预言“异性爱霸权地位终将崩溃,从废墟上将升起超性别意识”^[1]。《露珠》中,男色公关更多是性欲对象,作为女性情欲对象的,则是同性。这点上,叶弥践行着,也可以说是尝试着走向“超性别意识”,探讨女子的互助与共存,她写出了这种女性情谊联盟的艰难和不易,这种联盟注定受挫。

首先,维持这样的俱乐部的是金钱。女主人公对父亲炫耀自己有钱,炫耀养几个男人别人会佩服,但李佳梅们后来砸了男性为主的俱乐部不怕拘留,也并不是因为自己真正的势力如何大,而是仗着有超过千万的资产加上自身的容貌。这种女性的解放实际上并不是真正的解放,只不过因为自身钱财的充满,才有权利支配男人,而本身用的方式和观点还是男权社会话语建立的。其次,这些女性情谊的维持靠的多是表象,如随意和男性同居,互相包养同一个吃软饭的男人而不争风吃醋,这些本来也是一种伪饰。再次,她们所建立的俱乐部,只是个人的,并没有得到来自男性的尤其是社会的集体认同。对男人的渴望,或者是渴望成为男人,使她们用的是男人的方式来对抗男人。所以,最后的结局是女性的突围彻底破灭了,“夏娃俱乐部”最终宣布了破产。男色们依然你方唱罢我登场,活跃在这些缺性又缺爱的富婆女人中间,寻找他们的猎物,也同时成为猎人手中的货物,彼此成全。

叶弥2014年发表于《花城》首期的《幸存记》,也是以一个年轻的男性性工作者口吻来描写男妓的生活,写到了由于性事过度,死在富婆们中间的一个同事。叙述者是一个男色,明知灰暗的结局在等着他,但是他仍然前仆后继,在生存和物质面前,停不下自己的脚步。叶弥的这种对时代人物卑琐命运的书写,除了体现女子不易,也体现了男性的不易。时代的焦灼感赶着大多数人在欲望的沼泽里奔走,人们已经无法停下自己的脚步,甚至,作家如此写,也是感受到了这种焦灼对自己的索命追捕。

另外,其他一些女作家也侧面地写到不同面相不同性格的男性性工作者,表现女性的欲望与男性的生存危机。九丹《女人床》、孙瑜《空心床》都是以女性的眼光书写男性性工作者,既反映了此是消费文化盛行之后流行的产物,也反映了文化迷失者们在社会中空虚无聊的一面,同时也表达了性工作者不光有性别划分,亦有等级划分。不同的性工作者,由于个人际遇和个人性格经历的不同,命运也不同。周洁茹《你疼吗》写到一个美容院的男性老板喜欢对顾客动手动脚,各种轻柔撩拨若即若离,结识了一群“表姐们”,他给她们提供身体,她们给他提供资金,让他拓展事业。

一般而言,女性较为感性,在现实常态生活中,女性的爱情多以结婚为结果,而婚姻,实际多半是以外在的社会标准为前提,一些男女的结合并不纯然因为爱情,但即便是因为爱情,在这个文化快餐时代,爱情也几乎变为快餐的一部分,婚姻的建立和维持,就多建筑在物质基础上,以利益交换为目的,生儿育女,维持表面的社会形象。实际上,女性的心思比较复杂幽微,社会地位和能力大小在婚姻里并不对等,这必然导致婚姻冲突。女性在婚姻内被性化或者被作为生育机器生育化,如果经济条件

[1]陈染:《超性别意识与我的创作》,选自《断片残简》,〔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24-127页。原载《钟山》1994年第6期。

尚可,对传统的男女关系失望,难免寻找男性性工作者对自己进行身体和情感的补偿和抚慰,甚至可以说,报复。这些小说集中反映了女性的欲望是无助的,注定落空,陷入时代的黑洞里,但同时也显示了资本侵蚀下青年男性对自己的异化出售行为。男性以潜在的性出售,换取丰富的利益以求自身发展,而他们的灵魂在日渐漂泊的生活里走向随波逐流,他们也同样陷入时代的危机之中。

三、消费男色:欲望背后的权力关系

色情业在世界范围内古往今来一直存在,但是色情业的受惠者大多都是男性,女性作为受害的一方存在着。中国古代文人,更是将青楼描绘为一处旖旎之所,中国古人的恋爱,也多发生于青楼妓馆。女性作为被消费的对象,一直存在着,即使是1949年之后的30年,权力与女色的交换,权力对女性的压榨,也一直存在。关于女性真正消费男色的长篇小说,女作家陈玉春《男色》(又名《男人陷阱》)可以算第一部。《男色》讲述的是中国一批现代富婆和中国男性性工作者之间复杂的另类的上层生活,书中描绘了一群为女人提供性服务的年轻男性性工作者。虽然他们出身贫寒,无什么学历,但是他们年轻英俊,作为“公关先生”,也是一笔非常有效的资源。女作家在作品里如此大规模的描写男色,不能不说是挑战对男权社会的挑战。

在消费时代,对于男色的不同形式的消费,除了与媒体传播以及消费文化的兴盛相关外,更与消费男色的主要对象女性的社会经济地位以及身份的提高有关系。也就如博德里亚所说一样:“不论在何处,问题都在于性膨胀,性欲是消费社会的头等大事,它从多个方面不可思议地决定着大众传播的整个意义领域……性本身也是给人消费的。”^[1]女性对性的消费欲望和男性一样,有很强的生理欲望和精神欲望。在“文明化”的进程里,相对而言,女性的性欲显得被动消极,但是,从当下对于男色文化的热烈反映可以看出,女性也可以是并且也能够是男性肉身的消费者。消费社会中,每个人都是消费者,都逃不出时代的陷阱,都可能互为消费品,无论是不同性别的相互消费,还是同一性别的相互消费,一切物(包括观念上的物)都可以是消费品,比如情感的商品消费。在这种语境和社会环境下,男色成为女性消费对象的一部分,就是“符合意义”的消费,也是女性在建立自己主体文化,建立新的女性形象。

小说中,艾珊、弥、周洁等是几个婚姻触礁的富有女子,有着较宽裕的经济和时间,也受过高等教育。为了平衡自己和报复在婚姻内受到的不公正待遇,她们各自私下找男性性工作者,寻求身体和精神的慰藉,成为费兵、李森、石头等一群年轻男性工作者的“雇主”。费兵、李森、石头等男色是一批寻找发财梦的外省青年,出身家境不好,文化低,无特长技能,但是因为长相英俊,他们被聘为“公关先生”,和男作家王宛夫《机关滋味》里面的公关先生有一致之处。这些人主要是向可以支配金钱和权力的特殊阶层提供性服务,借以获得钱财和其他报酬,他们或者被迫、或者主动地操着皮肉生意。

作品中,以“我”(艾珊)的口吻叙事,“我”年轻貌美,丈夫却性无能,所以过着无正常意义上的婚姻生活,身体乃至心理都受着情欲饥渴的折磨。在去俱乐部游玩时认识了年轻的费兵,被其英俊打动,因此随后就与他发生了性关系。而一直服务于老丑有钱的女人的费兵在“我”艾珊身上第一次尝到了生理的快感,由此对顾客产生了爱情。然而,这种似乎是交易又似乎是爱情的复杂关系不为社会和伦理道德所接受。最后,费兵如同大多的生意人一样,走上了卖身者正常的道路,被一个香港富婆包养,与“我”(艾珊)在车站充满伤感地告别。

艾珊的朋友弥有当代社会所说的畏触症,这是西美尔提出的观点,尼采也有过简单的表述。弥并不喜欢找情人,怕被缠住,得养着他,索性只是找男人玩。跟李森在一起不求其他,不拖不欠玩的开心

[1]博德里亚:《消费社会》,刘成富、金志刚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59页。

就好。李森有个至爱的女朋友,为了与女朋友摆脱贫困生活才卖身的。李森为赚钱不惜一切,随意与人发生关系,最后在一颗贵重的钻戒的诱惑下,和一个香港来的男人发生了同性肉体关系,不小心染上了艾滋病,最终悲惨地跳河死去。其遭遇和很多陷入贫困被迫卖身的女性性工作者相似,很模式化,但是苦难的叙事还是隐隐地为其作品加上了浓重的悲剧色彩。相比较而言,周洁与石头的关系相对简单一些,他们没有肉体上的紧密关联,多是精神抚慰,但同样也是游离在正常的社会关系之外的,不受祝福。

费兵、李森、石头,这三个男性性工作者,靠出卖色相为生,虽然是自主选择自身难辞其咎,但也是社会一步步引诱的后果。艾珊、弥、周洁三个受过高等教育相貌还可以社会地位也相对较高的女性,挣扎在很不美满的婚姻里。出于身体和心理需要,出于对生理的以及精神的爱的渴望和需要,远离了婚姻的轨道,看起来也是应该审问的。但是,从一定程度来说,她们在婚姻之外,得到了一种慰藉和满足,谁又能全然否定这种感情呢?整本小说,人物的挣扎无处不在。无论是婚姻里不幸福职场上成功的女性,还是作为性工作者的男性,他们的挣扎都是严肃的,都来自具体的实实在在的生活。他们求得并不多,但是,他们挣扎的那么艰辛。如同女性性工作者一样,他们一样处于社会的边缘地带,生活在人们暧昧的眼光里,演绎着生之不易、爱之艰辛。

“女性对男权的解构是软弱的,女性的解构之路也是相当漫长的,男性文化早已巩固好的一整套霸权话语,规定着这个世界的秩序,也规定着两性不同的形象。”^[1]陈玉春以细腻的笔调揭开了这一块隐蔽的角落。在当代文学作品里,以此为描写主题的尚为鲜见。虽然作品里每个角色都是软弱的,但是显示了作者对男女关系探索的努力。女性作家更注重社会发展对个人的影响,而不是宏大叙事。小说鞭挞丑恶,但也从不和谐的性交易里,寻找隐藏在人性幽暗之地的亮色,以及小人物的彷徨无奈、颓废,甚至罪恶。

与《男色》题名同样有趣的,是发表于同一年的《男豆》,其作者是女性作家钟物言。顾名思义,《男豆》也是写男性性工作者的小说。《男豆》的女性主人公叫男豆,徘徊在包养自己的大款王波和自己包养的情人林峰之间,辗转演绎资本与爱情不断发生冲突的故事。就本质而言,《男豆》也是在“影响的焦虑”下产生的一种对两性生存和斗争的表达方式的追寻。与《男色》同样,《男豆》同样是在一个较大的尺度之内,表现了“性”在女性写作中的特殊的意义。《男豆》中有一段话表达欲望:“在这个崭新的时代里,卖淫也不失为一种时髦。是男人的时髦,也是女人的时髦。”^[2]很显然,无论男性性工者,还是女性性工作者,都已经成为一种消费的符号,进入消费体系。而就书名而言,《男豆》和《男色》都有一种挑衅心理在里面,是多年来男性对女性不公所导致的那种郁郁不平之气的反弹。对于这种故意以性别色彩命名且含有明显敌意和贬损的写法,长远而言是不利于女性文学的成长和发展的,但从客观方面来讲,是可以更容易唤醒女性的自我意识。

男性,被文化建构为“力”的产物,女性作家在建构男性性工作者时,相对而言,是在反抗现有的大众文化中男性形象的特征,在重新确立女性的坐标,建构属于女性的话语体系、权力体系、身体欲望体系。女性作家描写男性性工作者的小说,就是在当代,也是大胆且勇敢的。相对于传统的男性作家描写男性性工作者侧重于从身体和社会地位进行表面的描述书写,女性作家塑造男性性工作者,更注重心理的描写,注重从女性的审美角度出发,满足女性对男性在生理和情感方面的某种想象。

女性作家描写受辱的不被肯定的容易屈服于生活的男性性工作者,一方面是变相宣泄自身在社

[1]许志英、丁帆主编:《中国新时期小说主潮》,〔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461页。

[2]钟物言:《男豆》,〔北京〕现代出版社2002年版,第1-2页。

会中的性别压力,以看客的姿态在作品里消费男性,寻求自我价值;另一方面,也是在一种虚构的文学建筑里,潜意识提升自身的社会地位。女性作家书写男性性工作者,体现了女性微妙的心理矛盾,一方面,在人物设定方面,不得不符合女性诉求的理想的平等关系;另一方面,却又将现实中男女关系的不平等兑换为作品里女男关系的不平等。一方面想表现女性的独立和反抗,寻求自身性别价值,另一方面却不得不借助男性的权力机制话语体系重构女性形象,以此弱化男性性工作者,来显示自身的强大,实际上却暴露了女性内心的不坚强,以及男权社会赋予男性的势力的强大。

小 结

总之,女性作家描写男性性工作者,是女性渴望建立和掌握自己的女性话语权,也是在追求一种新鲜刺激的书写体验,是对于性欲和爱情在婚姻家庭之外人性的追求和想象,同时也是对以男权文化为中心的社会的一种性意淫,在生活 and 书写中建立虚拟的安全感,回击男性。女性作家塑造的男性性工作者形象,有着明显的男权烙印的意识,是恋父情结的一种特别置换,在传统的“看”与“被看”间努力逆转性别对抗。身为女性却不断试图向男性文化靠拢,一面寻求自我价值,一面脆弱,渴望被保护,这也显示了女性建构男性性工作者形象的无力以及女性自身的脆弱。

在现代化进程中,性工作者与性工作者所面对的顾客,几乎都是由于物的匮乏在寻求支撑,这种“物”既指物质的,也指精神的,是一种填不满的欲望,归根到底,是信仰缺失或者信仰异化而产生的,是时代发展进程中必然面对的“茫然若失”。在弗洛伊德看来:“满足没有受到自我驯服的狂野本能冲动可以产生幸福感,这种感觉绝对比通过满足受到自我驯服的狂野本能所产生的幸福更强烈。”^[1]弗洛伊德这里所说的“满足”,主要是一种性欲的满足。对“物”的欲,在某种程度上,也是性欲的转化,是一种原始的狂野冲动经过文明熏陶的转移。归根到底,这一切问题,是作为人的信仰的严重缺失所导致的精神疲软。然而,作为一种女性写作,女性在对男性性工作者的揣度和描摹时,宣泄了自身在男女感情中受挫的体验,抛弃了传统的主流话语和道德,在禁忌里寻找安慰和佑护,是进步的。女性作家通过对男性性工作者的幻想和描述,解构了传统文学、传统伦理和传统的生活方式,营造了超越大部分人所居于期间的现实,构建了真正的女性主义文本,使得性,尤其是男性的性,男性性的出售,不再为男性作家所把持,争夺了部分的话语权,突破了之前女性在这个领域被遮蔽的状态。这既归功于当代社会女性取得的较为突出的表达平台,也一定程度上客观显示了娱乐至死年代的一种精神追求。但客观地说,女作家在异化男性的时候,也异化了自身。

20世纪80-90年代开始,女性意识逐步觉醒,先是关注自身内心的呼求,关注自己的身体,虚构女性身体和经验以供男性观看;接着关注男人的身体,对男人的身体进行想象和描绘,进行批判和修改,逐渐瓦解以男性为主导的主流文化以及叙事模式,将男性当作观看和把玩娱乐的对象,在作品里描摹,获得审美的快感。从女性自身出发,建构一种新的男性与女性、男性与男性的关系,并通过这种方式表达女性的自由意志、权力向往(日常生活的政治权力)。女性作家对男性性工作者进行热情的书写,是一种女性文化实践行为,不过这一文化行为并没有改变男性根深蒂固的主导地位,女性面对的仍然是一个男权文化为主导的社会,女性仍需努力。

[责任编辑:平 啸]

[1][奥]弗洛伊德:《一种幻想的未来——文明及其不满》,严志军、张沫译,〔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71页。